

DOI: 10.19361/j.er.2020.01.10

外出务工经历、创业行为与创业绩效

谢 勇 杨 倩*

摘要: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外出务工农民的返乡创业问题。本文使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创业的概率,但对其创业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外出务工期间从事管理、雇主和自雇工作的经历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创业的概率及其创业绩效,而外出务工时间的长短对于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均不存在显著影响;关于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历特别是外出期间从事管理、雇主和自雇工作的经历不仅有助于返乡创业资金的积累,而且有助于掌握创业需要的经验和技能。本文拓展了外出务工经历对于农村劳动力创业的因果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并为促进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以及提高创业绩效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外出务工经历;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创业绩效

一、引言

外出务工农民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外出务工农民返乡的现象也始终存在,并且在宏观经济运行出现波动的年份及其随后的一段时间中甚至还会出现外出务工农民大规模返乡的现象。总的来看,大约17%~38%的外出务工农民最终永久性地返回了家乡(谢勇、周润希,2017)。

由于外出务工农民外出务工期间可能积累或掌握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因此为了促进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就业创业,并进一步带动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各级政府近年来高度重视返乡农村劳动力的创业问题。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鼓励外出务工农民带技术、带资金回乡创业,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带头人”。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以及我国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以后,中央在所有涉及外出务工农民就业的文件中均将促进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作为重要的政策措施,同时将返乡农村劳动力作为重点扶持的创业群体之一。

近年来有大量文献对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及其创业行为展开了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

* 谢勇,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劳动就业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邮政编码:210095,电子信箱:xy@njau.edu.cn;杨倩,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劳动就业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邮政编码:210095,电子信箱:441837056@qq.com。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个方面:一是返乡农民的特征与就业状况。这些文献侧重于考察个人与家庭特征、人力资本水平、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对于外出务工农民返乡的影响,以及他们返乡之后的就业状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Zhao, 2002; 石智雷、杨云彦, 2012; 谢勇、周润希, 2017)。二是外出农民返乡之后的创业行为以及外出务工经历所产生的影响。有些文献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对于返乡农民的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Demurger and Xu, 2011; 罗凯, 2009; 周广肃等, 2017; 徐超等, 2017),但也有部分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白南生、何宇鹏, 2002; 熊智伟, 2018)。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重点完成以下两方面的工作:首先,考察外出务工经历对于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除了是否具有外出务工经历之外,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外出务工的时长、外出期间从事的工作类型对于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全面地认识外出务工经历对于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的影响。其次,分析并检验了外出务工经历对于农村劳动力创业绩效的因果影响。创业绩效的高低是衡量创业活动成功与否以及是否可持续的重要标志,但已有研究很少关注外出务工经历对于农村创业者创业绩效的影响,本文将分析并检验是否具有外出务工经历、外出务工时长、外出期间从事的工作类型对于农村创业者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

二、文献综述

在国际上关于外出务工经历与回流者创业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其主要关注对象是国际移民,重点考察了海外工作经历对劳动者返乡之后就业和创业行为的影响。理论上一般认为,返乡者外出期间会进行各类创业资源的积累,主要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企业家精神等(Dustmann and Weiss, 2007)。与此同时,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一般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返乡者拥有的各类要素在家乡往往具有更高的边际报酬,因此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者的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试图从生命周期或目标达成的视角理解国际移民的返乡创业或就业行为(Dustmann, 2003)。相关文献认为,劳动者在外务工之时就做出了未来返乡创业或就业的决策,因此他们事先就确立了外出期间需要完成的某些目标,例如掌握职业技能、积累储蓄等。一旦上述目标实现,这些外出者就会返乡进行创业活动(Kirdar, 2009)。

大量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具有海外工作经历的回流者从事创业活动的比例明显高于那些没有移民经历的劳动者(Dustmann and Kirchkamp, 2002)。例如 Gubert 和 Nordman (2011) 基于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调查数据显示:大约 30% 的海外务工者在回到家乡后进行了各种类型的创业活动,并且上述活动的发生明显受到他们的海外就业经历的影响。Arif 和 Irfan (1997)、Ilahi (1999) 基于巴基斯坦的研究都发现,海外回流劳动力更可能从事自我雇佣而不是受雇于别人,并且那些准备返乡后进行创业的劳动者在海外务工期间的储蓄水平也显著更高。McCormick 和 Wahba (2001)、Wahba 和 Zenou (2012) 研究了埃及返乡者的创业行为,同样发现返乡者在海外工作期间的储蓄水平、海外工作的时长与其返乡后的创业活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一些基于摩尔多瓦、塞内加尔等国海外回流者的研究也都得出类似结论(Borodak and Piracha, 2011; Kveder and Flahaux, 2013)。

相比较而言,研究海外务工经历对于返乡者创业绩效的文献较少,但都肯定了其积极作

用。例如 Marchetta(2012)基于埃及的研究显示,创业者的海外移民经历可以显著增加所创办企业的寿命,并且这一结论在考虑了海外经历的内生性之后依然成立。Piracha 和 Vadean(2010)发现阿尔巴尼亚的海外返乡者在创业时更多地选择了创办企业的形式,并且他们的经营规模和雇佣规模更大,业绩也更好。

目前关于中国外出务工农民群体的研究较多。由于外出期间从事的各种非农就业可能有利于这一群体在资金、技术、企业家精神等方面的积累(Liu et al., 2019),进而有可能会对他们返乡之后的创业活动产生促进作用,学术界对于返乡农村劳动力的创业行为也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已有文献主要分析了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的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返乡者的人口学特征、人力资本状况、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孔祥利、陈新旺,2018;曹宗平,2019)。总的来看,上述相关文献的研究对象是返乡农民群体,主要关注返乡农民的创业意愿与行为(汪昕宇等,2018)。很少有研究立足于全体农村劳动力,考察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在已有的研究中,Murphy(2002)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江西两个县的调研发现,农村劳动力在外务工期间提升了人力资本并积累了资金,从而有利于返乡之后开展创业活动,进而推动家乡的经济发展。Demurger 和 Xu(2011)基于安徽省无为县的研究显示,返乡农民从事自我雇佣的概率大于从未外出过的农村劳动力,并且随着在外务工期间内的储蓄水平和更换工作频率的上升,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后从事自我雇佣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加。以上研究使用的均是地方性调研数据,而罗凯(2009)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的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创业参与率。周广肃等(2017)、徐超等(2017)均使用2007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居民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并都通过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处理,结果分别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将农村居民创业的概率显著提高了1.8个百分点和5.16个百分点。

但也有个别研究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例如白南生和何宇鹏(2002)就认为返乡外出务工农民与未曾外出农民没有明显差异,返乡者都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失败者,或者是被相关政策赶出了城市,因此他们返乡后大都回到了传统经济结构中,很难从事相关的创业活动。Wang 和 Fan(2006)的研究也显示,大部分外出农民都是基于生命周期原因或者难以适应城市劳动力市场而返乡,认为家乡拥有更好发展机会(包括创业)的返乡者比例其实很低。熊智伟(2018)基于中部五省的调查发现,返乡农村劳动力创业失败的现象比较普遍。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社会各界之所以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给予特别关注,主要基于这一群体的外出务工经历可能有助于其积累资金、掌握技能、培养企业家精神。但已有相关研究却主要从个体和家庭特征、创业政策等方面分析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对于外出务工经历与创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的文献很少,并且所使用的数据要么基于某一地区的小样本调查,要么来源于2007年及以前的调查,在数据的代表性或时效性方面存在不足。其次,外出务工经历包括外出时长、务工类型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对于创业行为可能存在着不同影响,但已有研究对此却较少涉及。最后,创业绩效的高低是衡量创业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业活动的可持续性以及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的大小,但是已有文献并未研究外出务工经历是否会对农村劳动力的创业绩效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因此,本文将系统研究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的影响。

三、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的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CLDS2012的样本覆盖了中国大陆除西藏、海南之外的全部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并采用了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在剔除城镇户籍样本、没有劳动力市场工作经历的农村受访者(包括在校学生、现役军人、家务劳动者和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等)以后,最后得到农村户籍劳动力样本9 879人,其中调查时仍然在外务工或暂时性返乡的受访者达到2 581人,剩余7 298名样本为农村常住劳动力,其中6 248人报告了自己的就业状况信息,上述样本构成了本文的基本研究对象。

(二) 变量界定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包括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两个方面,具体界定方法如下:(1)创业行为。CLDS2012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分为失业、务农、雇员、雇主、自雇非体力劳动者、自雇体力劳动者六种情况。根据已有文献的通常做法,我们将“雇主”、“自雇非体力劳动者”和“自雇体力劳动者”定义为创业行为,并设置为虚拟变量(是=1,否=0)。(2)创业绩效。一般可以从利润水平、资产回报率、经营收入、雇佣规模等方面对其进行衡量。但考虑到农村劳动力通常以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的形式进行创业,生产经营规模相对较小,财务统计也并不规范。基于以上原因,并结合CLDS2012的问卷设计内容,本文将农村创业者“上一年度的经营性收入”作为创业绩效的衡量指标。

2. 自变量

外出务工经历同样内涵丰富,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界定:

(1)是否具有外出务工经历。该变量为虚拟变量(是=1,否=0),据此可以将农村常住劳动力分为“有外出务工经历(即返乡外出务工农民)”和“从未外出过的劳动力”两部分。

(2)外出务工的时长。我们使用外出农民最终返乡的时间减去初次外出的时间得到外出务工的时长。一般认为,较长的外出务工时间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积累各项创业资源(例如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企业家精神等)。但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期间主要从事简单、重复性的体力劳动(白南生、何宇鹏,2002;温兴祥,2017),因此外出务工时长对于外出务工农民积累创业资源和能力的作用并不明确。

(3)外出期间从事工作的类型。显然,外出农民在外期间从事的工作类型对其积累创业资源和能力至关重要。一般认为,从事过管理工作以及具有雇主或自雇经历,不仅有利于提高外出务工农民的经营管理能力、培养企业家精神,而且外出务工农民的收入水平往往相对较高,从而有利于其创业资金的积累(Dustmann and Kirchkamp,2002)。因此本文设置了工作类型虚拟变量,将外出务工期间从事过管理、雇主和自雇工作赋值为1,将未从事过相关工作赋值为0。

3. 控制变量

除了外出务工经历以外,农村劳动力的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还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根据已有的相关研究,本文还控制了以下几个方面变量:(1)个人与家庭特征,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家庭人口规模、家庭人口年龄结构等人口学特征,以及家庭拥有的人均耕地面积。(2)人力资本状况,包括受教育程度、接受职业培训的情况,以及是否从事过农业生产。此外,考虑到个人能力对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的影响,本文选择“母亲的受教育年限”作为能力的代理变量。(3)政策与区域变量。近年来各地政府陆续制定了一些鼓励和扶持返乡外出务工农民创业的优惠政策,这可能对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我们通过网络检索和资料查找,检索了在调查时间(2012年)内各省份是否出台了针对返乡外出务工农民的创业扶持政策,并设置为虚拟变量(有=1,其他=0)。此外,考虑到中国各省份之间的离乡打工风俗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本文使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各省份外出人口的比例作为衡量打工风俗的变量。

(三)描述性统计

在前文相关界定的基础上,表1报告了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创业的基本情况。农村劳动力从事各种类型创业的总体比例为10.92%,而在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受访者中,该比例达到了16.76%,大约是从未外出者的1.77倍,并且上述差异在1%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进一步的比较显示,长期外出者(4年及以上)、外出期间从事过管理、雇主、自雇工作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各类创业活动的比例均显著高于从未外出过的受访者。尤其是具有管理、雇主、自雇工作经历的返乡农民,创业的比例高达23.54%,大约是未外出者的2.5倍。返乡外出务工农民内部的比较显示,长期外出者返乡后的创业比例与短期外出者(4年以下)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从事过管理、雇主、自雇工作的返乡者创业的比例显著高于没有从事过上述工作的返乡者。

表1 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创业的基本情况

类别	创业比例(%)	年经营性收入(万元)
全体农村劳动力	10.92	1.994
返乡农民	16.76	1.749
其中:外出务工4年及以上	17.88	1.665
外出务工少于4年	16.22	1.785
从事过管理、雇主、自雇工作	23.54	2.646
未从事过管理、雇主、自雇工作	13.20	1.237
从未外出农民	9.48	2.099
不同类别之间差异的比较与检验	创业比例之差(%)	年经营性收入之差(万元)
返乡农民-从未外出农民	7.28 ***	-0.350
外出务工4年及以上的农民-从未外出农民	8.40 ***	-0.434
从事过管理、雇主、自雇工作的农民-从未外出农民	14.06 ***	0.547 *
外出务工4年及以上的农民-外出务工少于4年的农民	1.66	-0.120
从事过管理、雇主、自雇工作的农民-未从事过以上工作的农民	10.34 ***	1.409 ***

注:***、**和*分别表示相应类别样本的均值之差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后表同。

表1还报告了农村创业者的创业绩效,我们发现各组别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与从未外出过的农村创业者相比,无论是全体返乡创业者还是长期外出的返乡创业者,其年度经营性收入均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并且具有长期和短期外出经历的返乡创业者之间也不存在显

著的创业绩效差异。但外出期间从事过管理、雇主、自雇工作的返乡者,其创业的年经营性收入达到 2.646 万元,高于那些外出期间未从事过上述工作以及从未外出过的创业者,并且上述差异分别在 1%和 10%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

表 2 从总体样本、有外出务工经历、无外出务工经历三个组别报告了主要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并对有、无外出务工经历样本之间的均值差异进行了检验。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外出返乡组的女性比例显著更高,但更加年轻。并且从受教育年限、职业培训经历以及能力变量(母亲受教育年限)等多个方面来看,返乡外出务工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均显著高于那些从未外出过的农村劳动力,但他们拥有的农业生产经历和家庭人均耕地数量同时显著低于后者。在家庭人口状况方面,外出返乡组的家庭规模更大,并且家庭中需要抚养的 0~5 岁、6~15 岁孩子比例均显著较高,但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相对较低。此外,外出返乡组所在省份出台相关返乡创业政策的比例显著更高。

表 2 主要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与赋值	总体		有外出经历		无外出经历		均值之差 (有无外出经历)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1,女=0	0.521	0.499	0.402	0.490	0.552	0.497	-0.150***
30 岁以下	是=1,否=0	0.129	0.334	0.208	0.407	0.108	0.310	0.100***
30~39 岁	是=1,否=0	0.161	0.367	0.235	0.424	0.142	0.349	0.093***
40~49 岁	是=1,否=0	0.318	0.466	0.318	0.466	0.319	0.466	-0.001
50 岁及以上	是=1,否=0	0.391	0.488	0.239	0.427	0.431	0.495	-0.192***
小学及以下	是=1,无=0	0.658	0.474	0.598	0.491	0.674	0.469	-0.076***
初中	是=1,否=0	0.251	0.433	0.303	0.460	0.237	0.425	0.066***
高中	是=1,否=0	0.077	0.267	0.086	0.281	0.075	0.264	0.011*
大专及以上	是=1,否=0	0.014	0.117	0.013	0.112	0.014	0.118	-0.001
职业培训经历	有=1,无=0	0.061	0.238	0.084	0.279	0.054	0.277	0.030***
能力变量	母亲受教育年限(年)	1.927	3.154	2.348	3.326	1.818	3.099	0.530***
农业生产经历	有=1,无=0	0.839	0.368	0.759	0.428	0.859	0.348	-0.100***
家庭人均耕地	耕地数/家庭总人口 (亩/人)	2.043	3.261	1.639	2.616	2.148	3.401	-0.509***
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总人口数(人)	3.522	1.614	3.706	1.612	3.476	1.610	0.230***
0~5 岁孩子比例	0~5 岁孩子数/家庭总人口	0.088	0.187	0.101	0.180	0.085	0.188	0.016***
6~15 岁孩子比例	6~15 岁孩子数/家庭总人口	0.101	0.164	0.117	0.173	0.096	0.162	0.021***
65 岁及以上老人比例	65 岁及以上老人数/家庭总人口	0.077	0.195	0.066	0.170	0.081	0.201	-0.015***
所在省份返乡创业政策	有=1,其他=0	0.452	0.497	0.515	0.499	0.435	0.495	0.080***
打工习俗	“六普”中各省份外出务工人员比例	0.191	0.0445	0.198	0.040	0.189	0.045	0.009***
样本量		6 248		1 229		5 019		

四、计量模型与估计策略

(一) 基础模型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首先以全体农村劳动力为研究对象,检验是否具有外出务工

经历对创业行为的影响,见式(1)。

$$EP_i = \alpha_0 + \alpha_1 migration_i + \sum \alpha_2 F_i + \sum \alpha_3 H_i + \sum \alpha_4 D_i + \varepsilon_i \quad (1)$$

(1)式中: EP_i 是农村劳动力*i*创业行为的虚拟变量, $migration_i$ 衡量了受访者是否具有外出务工经历, F_i 是一组影响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 H_i 表示人力资本方面的变量, D_i 则是政策与区域变量, ε_i 表示残差项。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检验外出务工时长($migdur$)和外出期间从事工作的类型($migjob$)对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的影响,见式(2)和式(3),其中控制变量的选择与式(1)相同。

$$EP_i = \beta_0 + \beta_1 migdur_i + \sum \beta_2 F_i + \sum \beta_3 H_i + \sum \beta_4 D_i + \varepsilon_i \quad (2)$$

$$EP_i = \gamma_0 + \gamma_1 migjob_i + \sum \gamma_2 F_i + \sum \gamma_3 H_i + \sum \gamma_4 D_i + \varepsilon_i \quad (3)$$

类似地,为了考察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本文接下来以全体农村创业者为研究对象,设定式(4)–(6)。其中 EL_j 是农村创业者*j*上一年度的经营性收入,其余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择与式(1)–(3)相同。

$$\ln EL_j = \delta_0 + \delta_1 migration_j + \sum \delta_2 F_j + \sum \delta_3 H_j + \sum \delta_4 D_j + \varepsilon_j \quad (4)$$

$$\ln EL_j = \rho_0 + \rho_1 migdur_j + \sum \rho_2 F_j + \sum \rho_3 H_j + \sum \rho_4 D_j + \varepsilon_j \quad (5)$$

$$\ln EL_j = \varphi_0 + \varphi_1 migjob_j + \sum \varphi_2 F_j + \sum \varphi_3 H_j + \sum \varphi_4 D_j + \varepsilon_j \quad (6)$$

(二) 估计策略

根据因变量的数据类型,本文首先使用 Logit 模型和 OLS 模型分别对式(4)–(6)进行估计。但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是否拥有外出务工经历,甚至外出务工的时长以及外出期间从事的工作类型并不是随机产生的。例如表 2 中的数据已经清楚地显示:有外出务工经历和从未外出过的农村劳动力之间在个人与家庭特征、人力资本水平等方面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这在计量检验的过程中可能会引起选择性偏差的问题。此外,尽管本文在上述计量方程中设置了很多控制变量,但影响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的因素很复杂,我们仍然不能排除遗漏变量以及由此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在上述情况下,使用 Logit 和 OLS 模型难以准确识别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此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克服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差和内生性问题。总的来看,倾向得分匹配法的理论框架属于“反事实推断模型”,它认为任何因果分析的研究对象都存在可以观测到和未观测到的两种结果。例如在本文讨论的有无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的影响中,可以将农村劳动力或创业者分为两组:有外出务工经历(处理组)和没有外出务工经历(控制组),并将其界定为二元虚拟变量 $migration$ (处理组=1,控制组=0)。然后我们将其作为因变量,使用式(1)–(6)中的控制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 Logit 回归,从而得到受访者拥有外出务工经历概率的估计值,并计算倾向得分。在此基础上,根据倾向得分对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进行匹配。通过上述过程可以最大程度地控制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异质性,在两组样本变量均值没有显著性差异的情况下,PSM 方法可以控制选择性偏差以及内生性问题,估计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reatment, ATT),从而得到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

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的“净”效应(Rosenbaum and Rubin,1983)。

与上述过程相类似,在使用 PSM 方法估计外出务工时长和外出务工类型对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的影响时,本文将外出务工期间从事过管理、雇主、自雇等类型工作的农村劳动力界定为处理组,研究中的其他样本作为控制组。但由于外出务工时长属于连续变量,我们无法对其进行直接分组。因此根据样本的具体情况和研究目的,本文将外出务工时间在 4 年及以上定义为长期外出,并将该组农村劳动力界定为处理组,其余样本则属于控制组。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Logit 和 OLS 估计结果

我们首先使用 Logit 和 OLS 模型分别对式(1)-(3)以及式(4)-(6)进行估计,表 3 显示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影响的 Logit 估计结果。

总的来看,拥有外出务工经历可以使农村劳动力创业的可能性上升 1.39%,并且上述关系在 5%水平是统计显著的。与此同时,外出期间从事过管理、雇主和自雇工作可以将农村劳动力创业的概率提高 2.29%,该关系不仅在 5%水平上统计显著,并且边际效应也明显超过是否拥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影响。但是表 3 也显示,外出务工时长与创业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模型 2)。

表 3 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的 Logit 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外出务工经历	0.0139**	0.0067				
外出务工时长			0.0022	0.0030		
外出务工类型					0.0229**	0.0109
个人与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人力资本状况	是		是		是	
政策与区域变量	是		是		是	
Prob>chi2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 ²	0.1101		0.1091		0.1113	
样本量	6 170		6 170		6 032	

上述发现初步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在总体上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创业概率,但其中的影响机制主要在于外出经历是否有利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企业家精神等各项创业资源的积累,因此从事过管理、雇主和自雇工作的外出经历对于创业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大。但与此同时,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在外期间主要从事的是简单体力劳动,这些工作难以帮助他们有效地积累创业资源、提升创业能力,因此即使是长时间的外出务工也难以对他们返乡后的创业行为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

表 4 报告了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创业绩效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拥有外出务工经历尽管可以提高创业者的经营性收入,但是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此外,外出务工的时长与创业绩效之间也没有显著关系,这与表 3 中模型 2 的发现基本一致。但模型 6 的估计结果显示,外出期间的工作类型对于经营绩效存在显著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从事管理、雇主、自雇工作的经历可以将创业者的年经营收入显著提高 16.81%。

表 4 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创业绩效的 OLS 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外出务工经历	0.0656	0.0722				
外出务工时长			-0.0036	0.0379		
外出务工类型					0.1681 **	0.077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Prob>chi2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 ²	0.1047		0.1057		0.1035	
样本量	611		611		594	

(二) PSM 估计结果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中常用的匹配方法有四种:最近邻匹配法、分层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本文分别使用上述四种方法估计了外出务工经历类型和时长对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与创业绩效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具体结果见表 5,其中采用了 Bootstrap 反复抽样 500 次估计样本的标准误。

1. 外出务工经历、时长和类型对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的影响

表 5 的结果显示:无论采取哪一种匹配方法,拥有外出务工经历都对农村劳动力的创业行为产生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这说明在控制了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差和内生性问题以后,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的创业行为依然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在四种匹配方法中,ATT 估计值最小为 0.024,最大是 0.043,这意味着拥有外出务工经历将导致农村劳动力创业的概率显著提高 2.4%~4.3%。上述影响的强度明显超过了表 3 中使用 Logit 模型(模型 1)的估计结果,这说明如果不对相关的内生性问题进行纠正,将会明显低估外出务工经历对于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的影响。

但在外出务工时长对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的影响方面,PSM 的结果显示,四种匹配方法的 ATT 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外出务工时长没有对农村劳动力的创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该结论与表 3 中的结果也是一致的。表 5 还显示了外出务工期间的工作类型对创业行为的 ATT。在全部四种匹配方法中,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创业行为差异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在外务工期间从事管理、雇主和自雇工作的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各种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在 4 种匹配方法中,ATT 的最小估计值为 0.642,最大达到了 0.683,上述效应大约是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模型 3)的 3 倍。

总的来说,拥有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的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外出务工期间从事管理、雇主和自雇工作的经历,非常有利于外出务工农民积累相关资源,并提升创业能力,从而大幅提高了他们返乡后从事各种创业活动的可能性。但由于大量外出务工农民在外务工期间主要从事的是简单体力劳动,这对其积累各项创业资源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而导致单纯的外出务工时长并不能显著地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创业概率。

2. 外出务工经历、时长和类型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本文首先以全体从事创业活动的样本为研究对象,使用四种匹配方法估计了拥有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绩效的 ATT,但是全部匹配方法的 ATT 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在控制了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差和内生性问题以后,我们仍然没有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影响

农村劳动力创业绩效的证据。

与此同时,本文还估计了外出务工时长对农村劳动力创业绩效的 ATT,但是四种匹配方法的显著性水平也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我们认为其中的原因与外出务工时长对创业行为的影响相类似:外出务工时间再长,但如果从事的工作没有促进相关创业资源和创业能力的积累,也难以对其返乡后创业的绩效产生显著影响。

此外,本文还使用各种匹配方法估计了外出务工期间的工作类型对其创业绩效的 ATT。表 5 的相关结果显示:无论采取哪种匹配方法,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创业绩效的差异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外出务工期间从事过管理、雇主和自雇工作的经历对农村劳动力的创业绩效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因此,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创业绩效的影响较为复杂,是否拥有外出务工经历和外出务工的时长对创业绩效均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在外期间从事过管理、雇主和自雇工作却能够显著提高创业的绩效。这意味着,只有在外务工期间从事的工作有助于积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企业家精神等创业资源和提升经营管理能力,才能对农村劳动力的创业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表 5 PSM 分析的 ATT 估计值及 Bootstrap 检验

匹配方法	外出务工经历、时长和类型的影响	ATT	Bootstrap 标准误	Z 值
最近邻匹配法	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	0.043	0.021	1.97 **
	外出务工时长对创业行为	0.082	0.087	0.94
	外出务工类型对创业行为	0.642	0.103	6.23 ***
	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绩效	0.077	0.107	0.72
	外出务工时长对创业绩效	0.051	0.146	-0.35
	外出务工类型对创业绩效	1.146	0.259	4.42 ***
分层匹配法	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	0.036	0.017	2.05 **
	外出务工时长对创业行为	0.050	0.074	0.68
	外出务工类型对创业行为	0.676	0.090	7.48 ***
	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绩效	0.029	0.084	0.35
	外出务工时长对创业绩效	0.044	0.116	0.38
	外出务工类型对创业绩效	1.069	0.242	4.41 ***
半径匹配法	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	0.034	0.015	2.30 **
	外出务工时长对创业行为	0.035	0.061	0.57
	外出务工类型对创业行为	0.662	0.082	8.10 ***
	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绩效	0.049	0.064	0.77
	外出务工时长对创业绩效	0.007	0.091	-0.07
	外出务工类型对创业绩效	1.006	0.232	4.32 ***
核匹配法	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	0.024	0.012	1.97 **
	外出务工时长对创业行为	0.019	0.059	0.33
	外出务工类型对创业行为	0.683	0.078	8.75 ***
	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绩效	0.051	0.060	0.83
	外出务工时长对创业绩效	0.008	0.084	-0.09
	外出务工类型对创业绩效	1.020	0.227	4.49 ***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主要采取了以下两种方法:一是采用 CLDS2012 和 CLDS2014 两次调查的数据进行混合回归;二是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其中借鉴了相关研究的常见做法(徐超等,2017;周广肃等,2017),分别选择除了本人之外,所在村其他外出劳动力的平均返乡比例、平均外出务工时长以及外出期间从事过管理、雇主和自雇工作的比例作为外出务工经历、外出务工时长和外出务工类型的工具变量。因为一般认为,所在村某项指标的平均水平(不包括本人)与受访者的相应指标高度相关,但却不会对受访者的创业行为与绩效产生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使用 IV-Logit 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相关的计量检验^①。

基于 CLDS2012 和 CLDS2014 数据的混合估计结果(见表 6)显示:拥有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创业的概率,但是对其创业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②。上述结论与前文基于 CLDS2012 的研究是一致的。

表 6 混合估计结果

变量	创业行为				创业绩效			
	模型 7(Logit)		模型 8(PSM)		模型 9(Logit)		模型 10(PSM)	
	边际效应	标准误	ATT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ATT	标准误
外出务工经历	0.0168 **	0.0085	0.055 **	0.025	0.0812	0.0907	0.091	0.133
控制变量	是				是			
Prob>chi2	0.0000				0.0000			
Pseudo R ²	0.0891				0.1035			
样本量	16 340				1 362			

注:表中 PSM 使用的是最近邻匹配法,报告的是 Bootstrap 标准误。

表 7 和表 8 分别报告了外出务工经历对于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的 IV-Logit 和 2SLS 估计结果,相关结论与前文使用 Logit、OLS 和 PSM 法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因此总的来看,本文结论的稳健性较好。

表 7 外出务工经历与创业行为的 IV-Logit 估计结果(第二阶段)

变量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外出务工经历	0.0151 **	0.0071				
外出务工时长			0.0036	0.0049		
外出务工类型					0.0301 **	0.013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F 值	56.65		57.89		56.11	
Prob>chi2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 ²	0.1222		0.1207		0.1143	
样本量	6 670		6 670		6 532	

^①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报告 IV-Logit 和 2SLS 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邮件向我们索取。

^②由于 CLDS2014 没有调查受访者外出务工的时长以及在此期间从事的具体工作类型,因此无法检验上述变量对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的影响。

表 8 外出务工经历与创业绩效的 2SLS 估计结果(第二阶段)

变量	模型 14		模型 15		模型 16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外出务工经历	0.0711	0.0803				
外出务工时长			0.0017	0.0365		
外出务工类型					0.1841 **	0.082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F 值	43.44		47.67		46.78	
Prob>chi2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 ²	0.1314		0.1327		0.1273	
样本量	611		611		594	

六、影响机制检验

理论上一般认为,外出务工经历之所以会对返乡者的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产生影响,关键在于劳动者外出务工期间会进行各类创业资源的积累,其中主要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精神等,接下来我们将对上述影响机制进行相关检验。

(一) 外出务工经历对于创业资金来源渠道的影响

资金约束往往是农村劳动力创业的重要障碍之一。由于外出务工收入一般高于在本地从事各种就业的收入,从而有利于农民创业资金的积累。CLDS2012 调查了创业者注册资本(或投入资金)最主要的来源渠道,本文将来源于个人储蓄赋值为 1,来源于其他渠道赋值为 0。考虑到外出务工经历的内生性,我们使用了前一部分中选择工具变量的方法,并使用 IV-Logit 模型检验了外出务工经历与创业资金来源渠道之间的关系。

表 9 中模型 17 和 18 的估计结果显示:与从未外出过的农村创业者相比,返乡创业者以个人储蓄作为最主要创业资金来源的比例要高 7.24%,并且上述关系在 1%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外出务工时长以及外出期间从事过管理、雇主和自雇工作的系数估计值同样显著为正值,并且后者的边际效应更大。以上结果说明,外出务工经历在总体上有助于返乡创业资金的积累,其中外出期间从事过管理、雇主和自雇工作的经历具有更加明显的资金积累效应。

(二) 外出务工经历对于创业经验和技能的影响

除了创业资金的积累,在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精神方面的有效积累也是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者创业行为的重要渠道之一。CLDS2012 询问了创业者“您这次创业时良好的机会因素有哪些?依重要程度选三项”,本文将首选“有类似经验”或“有技术背景”赋值为 1,将首选其他选项赋值为 0,然后同样使用 IV-Logit 模型检验外出务工经历对于创业所需经验和技能的影响。具体估计结果见表 9 中模型 19 和模型 20。

与从未外出过的农村创业者相比,返乡创业者拥有相关经验和背景的可能性更高,并且在 1%水平上统计显著。如果外出期间从事过管理、雇主和自雇工作,上述关系不仅依然显著,并且边际效应大幅上升至 36.87%;但外出务工时长的系数估计值却并不显著。因此总的来看,拥有外出务工经历,尤其是从事管理、雇主和自雇工作的经历可以显著地为返乡后的创业活动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和背景积累。

表 9 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资金来源、创业经验和技能影响的 IV-Logit 估计结果 (第二阶段)

变量	创业资金来源				创业经验和技能			
	模型 17		模型 18		模型 19		模型 20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外出务工经历	0.0724***	0.0149			0.1159***	0.0316		
外出务工时长			0.0441**	0.0221			0.0215	0.0196
外出务工类型			0.1325***	0.0306			0.3687***	0.052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F 值	83.52		77.49		86.48		87.99	
Prob>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 ²	0.1353		0.1258		0.1274		0.1299	
样本量	636		653		653		653	

七、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各级政府近年来高度重视外出务工农民的返乡创业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帮扶政策。但与此同时,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外出期间主要从事的是一些简单、重复性的体力劳动,不仅工资水平偏低,而且也难以掌握创业所需要的经验和技能。许多返乡农民也都是由于自身条件难以适应城镇劳动力市场,或者出于照料子女、赡养老人等家庭原因离开城市。因此在上述情况下,外出务工经历能否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进行创业,并提升其创业绩效就成为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

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使用 2012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的影响。我们发现,从事各种形式创业活动的返乡农民比例达到 16.76%,大约是从未外出过的农村劳动力的 1.77 倍,但前者创业的绩效与后者并没有显著差异。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在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创业的概率,其边际效应大约在 2.4%~4.3%之间。外出务工期间从事管理、雇主和自雇工作的经历不仅可以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创业行为,而且对其创业绩效也存在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外出务工时间对于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均不存在显著影响。关于影响机制的检验发现,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特别是外出期间从事管理、雇主和自雇工作的经历不仅有助于返乡创业资金的积累,而且有助于掌握创业需要的经验和技能。

从促进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并提高创业绩效的角度出发,本文认为应该重视外出务工期间各种创业资源的积累,提升返乡农民的创业能力。本文研究表明,外出期间从事过管理、雇主和自雇工作的农村劳动力,返乡后进行创业的概率以及创业绩效均显著更高,但外出务工时间的长短对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却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只有在外务工期间掌握相关的经营管理经验、提升风险承担能力以及培育企业家精神,才能对返乡后的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对于有意返乡创业的外出务工农民而言,在外务工期间应重视各种创业资本的积累,多从事管理、雇主或自雇工作,通过掌握相关技能、学习管理

经营知识,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并培育企业家精神,从而在返乡后才能更好地识别创业机会、掌握更加有效的创业信息、利用各类有用的创业资源,进而减少创业中的困难,提高创业的成功率以及创业绩效。

参考文献:

- 1.白南生、何宇鹏,2002:《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曹宗平,2019:《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多重动因与特殊作用》,《广东社会科学》第3期。
- 3.孔祥利、陈新旺,2018:《资源禀赋差异如何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基于CHIP2013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产经评论》第5期。
- 4.罗凯,2009:《打工经历与职业转换和创业参与》,《世界经济》第6期。
- 5.石智雷、杨云彦,2012:《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社会学研究》第3期。
- 6.汪昕宇、陈雄鹰、邹建刚、任启敏,2018:《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 7.温兴祥,2017:《户籍获取、工资增长与农民工的经济同化》,《经济评论》第1期。
- 8.谢勇、周润希,2017:《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及其就业分化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第2期。
- 9.熊智伟,2018:《返乡农民工创业失败影响因素比较研究——基于我国中部5省微观调查数据》,《调研世界》第7期。
- 10.徐超、吴玲萍、孙文平,2017:《外出务工经历、社会资本与返乡农民工创业——来自CHIPS数据的证据》,《财经研究》第12期。
- 11.周广肃、谭华清、李力行,2017:《外出务工经历有益于返乡农民工创业吗》,《经济学(季刊)》第16卷第2期。
- 12.Arif, G.M., and M.Irfan. 1997. "Return Migration and Occupa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Pakistani Migrants Returned from the Middle East."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36(1): 1-37.
- 13.Borodak, D., and M.Piracha. 2011. "Occupational Choice of Return Migrants in Moldova."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49(4): 24-46.
- 14.Demurger, S., and H.Xu. 2011. "Return Migrants: The Rise of New Entrepreneurs in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39(10): 1847-1861.
- 15.Dustmann, C. 2003. "Return Migration, Wage Differentials, and the Optimal Migration Dura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7(2): 353-369.
- 16.Dustmann, C., and O.Kirchkamp. 2002. "The Optimal Migration Duration and Activity Choice After Re-migr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7(2): 351-372.
- 17.Dustmann, C., and Y.Weiss. 2007. "Return Migration: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UK."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45(2): 236-256.
- 18.Gubert, F., and C.J.Nordman. 2011. "Return Migration and Smal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the Maghreb." In *Diaspora for Development in Africa*. Edited by S.Plaza and D.Ratha, 103-126.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 19.Ilahi, N. 1999. "Return Migration and Occupational Change."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3(2): 170-186.
- 20.Kirdar, M.G. 2009. "Labor Market Outcomes, Savings Accumulation, and Return Migration." *Labour Economics* 16(4): 418-428.
- 21.Kveder, C., and M. Flahaux. 2013. "Returning to Dakar: A Mixed Methods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Migration Experience for Occupational Status." *World Development* 45(8): 223-238.
22. Liu, C.Y., L. Ye, and B. Feng. 2019.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Entrepreneurial Transition and

- Firm Performance.”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2(3) : 681–696.
23. Marchetta, F. 2012. “Return Migration and the Survival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Egypt.” *World Development* 40(10) : 1999–2013.
24. McCormick, B., and J. Wahba. 2001. “Overseas Work Experience, Savings and Entrepreneurship Amongst Return Migrants to LDCs.”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8(2) : 164–178.
25. Murphy, R. 2002. *How Migrant Labou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Cambridge, MA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6. Piracha, M., and F. Vadean. 2010. “Return Migration and Occupational Choice: Evidence from Albania.” *World Development* 38 (8) : 1141–1155.
27. Rosenbaum, P. R., and D. Rubin. 1983.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 *Biometrika* 70(1) : 41–55.
28. Wahba, J., and Y. Zenou. 2012.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Migr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Capital.”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42(5) : 890–903.
29. Wang, W., and C. Fan. 2006. “Success or Failure: Selectivity and Reasons of Return Migration in Sichuan and Anhui,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5) : 939–958.
30. Zhao, Y. 2002.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0(2) : 376–394.

Experiences of Working Migratio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Xie Yong and Yang Qia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Center for Labor and Public Policy,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ese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returning rural workers. We use the data of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 in 2012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working migration on rural labor’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xperiences of working in citi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but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Engaging in management, employer and self-employment during the going-out period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rural labor’s entrepreneurship and improve th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While the duration of working migration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finds that the experiences of working migration, especially the involvement in management, employer and self-employment, is not only helpful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venture capital, but also useful for mastering the experience and skills needed for entrepreneurship. This paper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the causal effect of the experience of working migration on rural labor’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influential mechanism, putting forwar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returning rural labors and improving their entrepreneurship performance.

Keywords: Experiences of Working Migration, Rural Labor,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JEL Classification: J61, M13

(责任编辑:彭爽)